

• 杨俊一 著 •

当代社会哲学引论

——唯物史观与转型发展



上海大学出版社

当代社会哲学引论

——唯物史观与转型发展

杨俊一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社会哲学引论——唯物史观与转型发展/杨俊一
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671-1139-4

I. ①当… II. ①杨… III. ①社会哲学-研究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8216 号

责任编辑 陈 强

封面设计 施羲雯

技术编辑 金 鑫 章 斐

当代社会哲学引论

——唯物史观与转型发展

杨俊一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4.75 字数 411 千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1139-4/B·075 定价: 62.00 元

导论	1
一、为什么是发展？为什么是现代化？	1
二、为什么是新发展观？为什么是社会哲学？	8
三、转型发展：建构主义或结构主义	21

上 编 转型变迁论

第一章 实践与“广义历史唯物论”	39
一、重读“文本历史唯物论”	39
二、当代唯物史观的“创新原理”	44
三、理论创新模式的解释张力	48
第二章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三维模式”	53
一、马克思西方社会发展的“更替模式”	54
二、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的“跨越模式”	56
三、马克思欧美转型发展的“变迁模式”	59
第三章 “晚年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	63
一、“后马克思主义”与“晚年马克思”的“对话”	64

二、《资本论》第三卷“股份生产方式”改造的构想	67
三、“后《资本论》时代”生产方式的变迁	71
四、中国小康社会结构整合的构想	76
第四章 实践模式与社会发展历时形态	82
一、实践模式的结构：生产与交往	82
二、实践模式的“逻辑—历史”前提	84
三、劳力经济模式：劳动力与产权制度	86
四、资源经济模式：从“资本”到“社会”	88
五、知识经济模式：“知识决定未来”	90
第五章 “企业制度”变迁与社会结构转型	93
一、制度变迁与中国企业定位的分析	93
二、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社会学考察	97
三、企业制度变迁诱致社会结构转型	100
第六章 “单位制度”变迁与社会结构转型	106
一、民生社会：权利平等、正义优先	107
二、“两位一体”：“企国同构”的“单位制度”（1949—1978）	111
三、“三位一体”：从“市民制度”到“企群分立”（1978—2003）	114
四、“四位一体”：历史优先还是价值超越？（2003—2008）	119
第七章 “社会管理制度”创新与社会结构转型	124
一、现代社会管理的“思想路线图”	125
二、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思想原则	128
三、社会管理基本问题及其主体结构分析	135

第八章 当代唯物史观的本体论转向	141
一、和谐论：当代唯物史观本体论的创新	142
二、社会论：当代唯物史观本体结构的创新	144
三、人本论：当代唯物史观本体范式的创新	145
四、分享论：当代唯物史观价值模式的创新	147

第九章 社会哲学的后现代转向	151
一、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产业结构转型	152
二、后现代转向：利奥塔、鲍德里亚与詹明信	154
三、解构之超越：唯物史观的实践建构	162

中 编 转 型 博 弈 论

第十章 人性模式：哲学与经济学比较分析	172
一、何谓“现实人”模式	173
二、人性模式差异的比较分析	175
三、人学：人性模式创新的分析构架	178

第十一章 社会转型与人的“实现形式”	183
一、转型期人的生产交往关系变迁	183
二、转型期人的“实现形式”变迁	186
三、转型期人多向度的“实现形式”	191

第十二章 社会转型与价值选择的“悖论命题”	195
一、“经济人”还是“道德人”？	196
二、生产主义文化还是消费主义文化？	199
三、短缺伦理还是致富伦理？	201
四、“事实存在”还是“真实存在”？	202

第十三章 “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的价值论阐释	205
一、“囚徒困境”与道德选择策略	205
二、道德选择对策的价值论分析	207
三、群体与个体：二元结构的价值整合	210
第十四章 价值“择优博弈”与理想信念整合	214
一、理想信念“生产”与择优博弈	215
二、价值择优博弈的目标定位	217
三、价值择优博弈的整合功能	220
第十五章 理想信念机制与价值模式变迁	223
一、理想信念与“相信机制”	223
二、理想信念价值模式的变迁	226
三、转型期理想信念的功能分析	231
第十六章 意识形态新视阈：超越新制度主义	236
一、意识形态的边界及其价值系统	237
二、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的功能	238
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视阈	240
第十七章 意识形态功能及其弱化的道德风险	244
一、意识形态“制度功能”的分析	245
二、意识形态弱化的“道德风险”	247
三、意识形态在企业管理中的文化功能	251
第十八章 跨文化管理的价值分析与整合	255
一、管理文化模式：机制与功能	256
二、西方管理文化模式的价值观	258
三、中国管理文化模式的价值观	262

四、跨文化管理差异比较的整合模式	265
------------------------	-----

下 编 转型制度论

第十九章 “制度是交往的产物”	277
一、制度本质认识的三维尺度	278
二、人性诸假设与制度行为	280
三、“制度人”：韦伯与威廉姆森	283
第二十章 制度起源论：技术、交往与秩序	288
一、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产权制度起源论	289
二、诺思的产权制度起源论	291
三、哈耶克的制度认识论：知识与秩序	293
四、埃格特森的制度博弈论	298
第二十一章 制度资本的结构与功能	303
一、信念与制度资本的再生产	303
二、制度结构及其“经济—社会”功能	308
第二十二章 集体行动与国家制度行为	317
一、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317
二、诺思：国家制度行为的分析	324
第二十三章 产权与制度的变迁形式	330
一、产权变迁：外部收益内部化	330
二、诱致性制度变迁	335
三、强制性制度变迁	339

第二十四章 制度创新模型：诺思与布罗姆利	343
一、制度创新的诺思模型	343
二、制度变迁的布罗姆利模型	347
 第二十五章 “内部人控制”与激励制度创新	 353
一、“两权分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353
二、传统公有制代理机制的效率分析	357
三、改革试点中委托代理关系的特点	360
四、组织激励方式的制度创新	363
 第二十六章 马克思制度变迁思想的当代视阈	 370
一、马克思制度变迁思想的分析构架	370
二、马克思制度变迁史的结构分析	374
三、马克思制度变迁维度的创新构想	377
 附录	
现代的,太现代的!	
——模仿解构主义“书写”的一篇习作	382
 后记	 385

导 论

一、为什么是发展？为什么是现代化？

（一）中国梦解析：中国式的现代化

2013年，中国社会各界都在关注和想象一个热词——“中国梦”。

什么是“中国梦”？学界和理论界在做深度解读。有的专家推出“中国梦十解”，也有的学者警示“中国梦的十个误读”。从中国转型发展的角度看，笔者以为，中国梦有着明确的目标模式和操作规程。其目标模式，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操作规程，就是两个100年现代化目标的实现。^①

第一个100年，即从1921年到2021年，建成中国小康社会。用邓小平的话说，小康社会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第二个100年，即从1949年到2049年，建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梦或中国式的现代化分三个阶段（三步走）：“1980年（250美元）——2000年（小康）——2050年（现代化）”^②。

① 习近平2012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中国梦》，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②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同西班牙政府副首相格拉会谈时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订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37页）

但从世界现代化模式的路线图来看,中国现代化梦想还有两个参照点:一个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线性现代化”,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现代化”。前者是“内生型现代化”,后者是“外生型现代化”;在时间序列上,内生型现代化模式先于外生型现代化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既要面对世界现代化先在模式的“游戏规则”,又要化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结构的不平衡矛盾。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在于,要首先有效地解决两类不同的现代化范式的优化问题。优化模式的质量取决于学习和创新的有机结合。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无论是学习还是创新,都是有成本或有代价的,成本或代价就是优化模式的起点。起点选择的好,模式的可持续性就强。问题的秘密在于,对起点的认识、解读和评估标准不同,模式选择的倾向差别很大。在这方面,可以说,“政治智慧”不可或缺!

从沃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大多是被动服从资本主义现代化,并被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边缘化”的结果,如不得不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原材料基地,不得不忍受原材料输出国或边缘化国家间的低价竞争而导致的不平等损失!

从“发展哲学”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前提下的现代化(“起点”存量的特殊性)。其现代化的前提就是不平等的。易言之,后发展国家现代化不单纯是一个简单的工业化,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发展的问题,而是首先如何治理贫困和不平等的问题。如果以贫困和不平等为前提,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一方面是如何摆脱对发达资本主义的依附性,另一方面是如何掌握后发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自主权。而不是简单地走“模仿现代化”或“援助现代化”的道路,如“华盛顿共识”。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无论是刘易斯的“二元体系论”,还是罗斯托的“成长阶段论”,都未对发展中国家“起飞”历史前提的特殊性,给予足够的重视。直到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才开拓了后发展国家关于“人”的因素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和意义。

在此意义上,中国梦的现代化就不仅是农业工业化的问题,同时还要面对如何治理“贫困”,矫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摆脱或克服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不平等问题。因此,既要转型又要发展,中国梦的现代化逻辑可以简化为图 1:

在这张图中,现代化主题在“世界场域”中,有两个时间序列,即中国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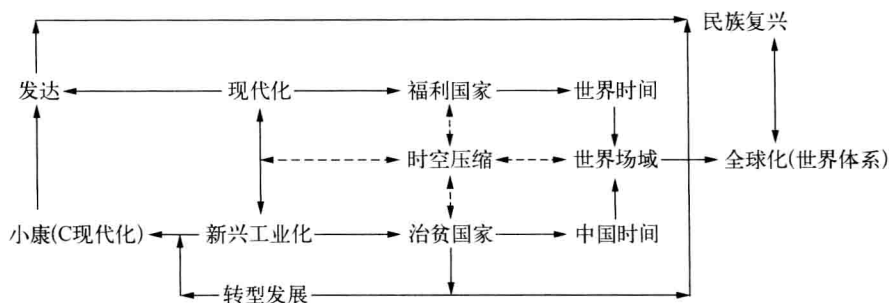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梦”路线图

和世界时间。从现代化的世界时间来看，一般地说，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路线图是：工业化——现代化——福利化。这“三化”的背景是“全球化”。从中国时间来看，其现代化的路线图是：治贫国家——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从两个系列发展的起点来看，西方的现代化是“线性的”，即农业工业化是一个自然序列，工业现代化是一个升级序列。中国的现代化是“结构性的”，其起点模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突出特点是贫困。解决温饱，别饿死人，事关重大，既是经济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半殖民地”本身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是不平等的。因此，现代化初期，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也是无奈之举。

中国式的现代化，又是赶超型的现代化。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还要面对西方现代社会的“福利化陷阱”。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无论从起点模式还是终点模式来看，都要面对结构不平等的双重挑战。一方面，纵向上，要面对结构性贫困的挑战；另一方面，横向上，又要面对“时空压缩”下，西方现代社会“福利化陷阱”的挑战。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既要强化并回应民生的福利诉求，又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从世界范围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化所面对的“不平等困局”，实际上也是大多数后发展中国家，已经面对或必然要面对的难题。这一点，或许具有规律性。中国在应对这一“不平等困局”方面，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付出了相当的学费。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来看，如以1980年作为起点模式，2050年作为终点模式，中国现代化的实现需要经历70年。如果将2012年作为重要时间节点，则中国的现代化已经经过32年。这一年，中国现代化的评估有两个重要指标，一个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列世界第2位，人均GDP列世界第87位；

另一个是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①,中国位列第101位。

仅用这两个指标评估中国现代化的质量是不全面的。但就GDP与HDI这两个指标的内涵的思想背景而言,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观。前者为数量增长,后者为质量发展。

这两个数字,还大致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或现代化的主要特征:转型发展。

(二) 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道路)

在国内的讨论中,关于转型发展,一般讲两个故事,一个是以一些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华盛顿共识”;另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北京共识”。前者由于采用的是资本主义“线性现代化”的“药方”,鲜有成功者。后者以雷默先生“北京共识”的讨论影响较大。但雷默先生的总结,更多地以个人观察和直觉为主,规范性阐释和国际经验的比较分析较少。但正因为其观点更感性,乃至更为直觉,恰恰提出的很多洞见则更为深刻!比如:“华盛顿共识”普适性的终结!

雷默先生虽然以北京为例,并未分析其他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国际经验,但其具备对中国特色发展经验的总结,如关于“好的发展模式”三要素:① 改革创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② 开放创新与世界经济接轨;③ 国家自主和平发展积累国家实力。又如关于“北京共识”社会物理学的三定理:① 改革创新而不是照抄“华盛顿共识”;②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追求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③ 独立自主和平崛起。^②

雷默先生强调的重点在于,“北京共识”引导中国从“治理贫困”的国家逐渐发展为“新型工业化”并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相反,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从“治理贫困”国走向“华盛顿共识”,按照增长经济学路径,并未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徘徊于边缘或半边缘国家的往复之中。它表明,在“世界体系”中发展现代化,不能忽视“结构性”的因素。如果嵌入“结构”,现代化的群图会呈现出时间序列意义上“三度空间”的态势。见图2:

① 人类发展指数 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0 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是一项用以衡量联合国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是对传统的 GNP 指标挑战的结果。人类发展指数(HDI)是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组成的综合指标。

② 雷默:《北京共识》,载黄平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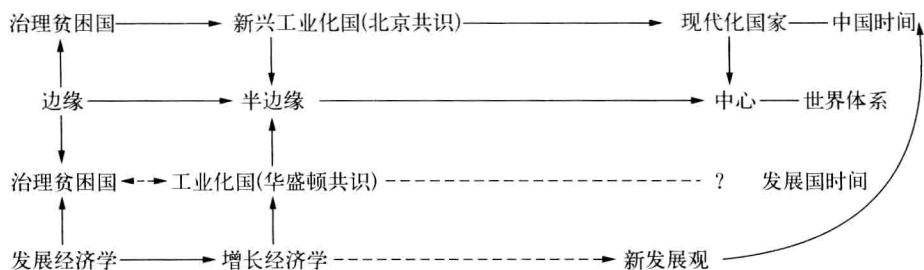


图2 发展时间序列的“三度空间”分析图

图2说明,无论是“北京共识”还是“华盛顿共识”,都“嵌入”在“世界体系”“不平等”的结构中,处于边缘、半边缘或结构中心的“位序”。如第一、第二、第三世界或超级大国等。“北京共识”的路径:治贫——发展——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从边缘走向中心;“华盛顿共识”的路径:治贫——增长——工业化——现代化困局,徘徊于边缘或半边缘状态。到目前为止,“北京共识”的路径:新发展观——中心位序——中国时间,几个要素呈正相关关系,值得关注。

(三) 斯蒂格利茨的中国现代化模式

关于中国转型发展模式的讨论,笔者以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规范性的比较分析有一定的代表性。就中国而言,转型发展,既有转型又有升级。前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后者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升级,当然也包括三次产业结构的梯度升级。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就资源配置方式而言,中国所谓的转型,就是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转型作用力的方向上,中国的转型带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色彩。这一点与南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脱贫增长”不同,其发展模式接近“北京共识”,而不是“华盛顿共识”。

斯蒂格利茨强调,中国经济社会的“起飞”,与一些南美发展中国家不同,是“发展与转型”共变。“转型”是发展的基础,是发展起点模式的特殊因素,而不仅仅是一个发展问题。因此,斯蒂格利茨将自己关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研究称为“转型经济学”或“新发展经济学”。

斯蒂格利茨指出,20世纪人类有两项伟大的经济学实验。第一项实验即从1917年开始的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第二项实验是社会主义经济重新转向市场经济的实验。

以2000年分界,概括或总结1990年起10年以后的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转型以及20年以后中国转型的经验教训,“总的说来,大多数观察家得出的结

论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转型是成功的,而俄罗斯的转型是失败的”。

“一个成功,另一个失败,我们从中应该吸取哪些教训?”^①

斯蒂格利茨指出,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前苏联国家的转型失败,并不是由于好的政策没有得到有效执行,而是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即对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及对制度改革进程最基本情况的错误理解。

俄罗斯对其多数工业和自然资源成功地实行了“私有化”,但总的固定投资额(实际上是市场经济萌芽发展的更重要的一个标志)在过去五年中明显下降(EBRD, 1998)。俄罗斯迅速成为一个耗费自然资源的经济体(extractive economy),而不是一个现代工业经济体。

与这些失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中国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转型”道路(而不是仅仅利用西方顾问们的“蓝图”或“处方”)。它的成功不仅在于经济迅速发展,而且创造了一个有活力的非国有集体企业部门。在俄罗斯制造业投资出现停滞时,中国的投资却飞速增长。

“有些评论认为两个国家在开始的时候就不一样——中国收入实在太低,因而赶上来的机会就会更大。相反,我却认为中国所遇到的挑战更大,因为它要同时面临‘转型和发展’两个挑战。中国比同等低收入国家做得好,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则多多少少比同等收入水平国家做得差。”

总之,教训之一就是,不能混淆手段和结果:比如,将私有化或公开资本账户看作是成功的标志而不是手段。建立市场经济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建立实现可持续、平等和民主发展的基础。

斯蒂格利茨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进行了总结和讨论。特别是从转型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了分析。笔者以为,斯蒂格利茨对中国模式的总结,可概括为“社会资本+混合经济”模式。为了简化起见,斯蒂格利茨对中国模式的分析,可参见图3:



图3 中国模式：“社会资本+混合经济”

① 斯蒂格利茨：《发展与发展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264—265页。

这一模式的基本内涵是,中国转型和发展的制度性因素有三个,即分权、农村经济和集体工业经济,其特点是增量改革,即通过发展新企业来改革已有的国有企业。

所谓分权,也就是邓小平讲的经济民主化。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中央与地方的适度分权,形成地方政府竞争和企业之间的竞争,极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农村发展采取家庭经济与集体经济两种形式,城镇发展采取非公资本企业和国有资本企业两种形式。这些经济形式大都带有中国特色的混合经济的特点,有其特殊的竞争逻辑。

以此为基础,中央政府通过发挥制度优势,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量改革。

如果说,斯蒂格利茨的中国模式有什么独特贡献的话,就是他对中国发展模式运行中“社会资本”的看重,他甚至强调,中国的转型所以会成功,就在于制度变革中保留并建立了行为惯例和基本准则——社会资本。笔者以为,所谓的社会资本,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制度优势”。^①

如果做进一步解读的话,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实际上是“两个可持续”,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和政治稳定的可持续。这一点和前苏联、东欧以及南美一些国家有根本的不同。易言之,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缺一不可。

概括起来,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成功是做对了两件事:一是转型,二是发展。在分析路径上,大致与“北京共识”接近。“北京共识”更多地侧重于发展动力的“改革物理学”,斯蒂格利茨更多地侧重于“制度优势”的政治经济学。

(四) 中国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

中国现代化梦想始于近代,但中国现代化成功探索并取得巨大成功,则是近 30 多年的事情。一般地说,现代化以工业化、城镇化和福利化为标志,但从中国现代化转型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是“五位一体”协同发展的过程。当然,这一目标模式也曾经历一个创新探索和再认识的过程,如从“两位一体”直至“五位一体”的认识和实践。图 4 是笔者概括的一个中国经

^① 斯蒂格利茨的社会资本是指一系列共识:规则、规章、政策、社会规范、制度等,在其文中,大致还包括组织资本、信息资本和隐性知识。就讨论中国制度变迁而言,大致是“制度优势”的意思。参见其《发展与发展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33 页。

济社会转型发展从起点模式向目标模式转型升级的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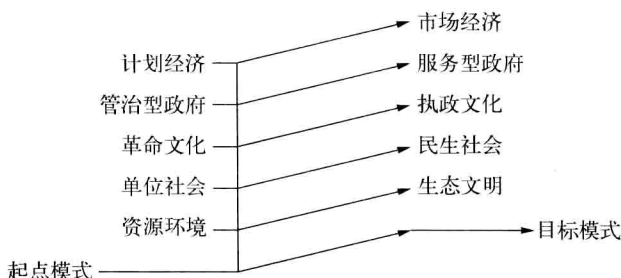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示意图

转型发展起点模式：经济上是计划经济，政治上是管制型政府，文化上是革命文化，社会管理以单位制为基础，生态环境是资源型的。

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在经济上转向市场经济，政治上转向服务型政府，文化上转向执政文化，社会上转向民生社会，环境上转向生态文明。

二、为什么是新发展理念？为什么是社会哲学？

（一）佩鲁：以人为本的发展哲学

长期以来，人们一谈发展往往与增长和 GDP 相关，但法国哲学家佩鲁 (Francois Perroux) 的《新发展理念》则进一步凸显了发展与人的关系，进一步凸显了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佩鲁指出，没有人的发展的增长是片面的增长，片面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增长。在此意义上，新发展理念强调，关于发展问题，首先是价值观和方法论问题。因此，经济学思考的前提，是哲学反思的起点。围绕这一思路，佩鲁提出了新发展哲学要回答的三个基本问题：

为什么：

——有增长无发展？

——有发展无进步？

——有经济振兴无“进步社会”？

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即把经济增长的基本元素抽象化为储蓄、投资、要素投入量、要素投入量与产量以及各要素投入量之间的关系、技术进步作用等观点不同，佩鲁提出了“以人中心”的个人全面发展的新发展模型。